

# 从地域特色看湖南精神特质

枕 戈

湖南文化资源丰富,尤其近代以来,湖南人屡屡力挽狂澜,成就了旷世伟业,也创造了辉煌的湖湘文化。但是,湖南精神的立论根据在哪里?需要深入梳理。

首先,在历史上,湖南被视为蛮荒之地,生存条件相对恶劣,今天的青山绿水在古代不过是穷山僻水。但所谓穷则变,变则通,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湖南人磨练出了霸蛮悍勇的性格,以及奋发图强的精神。

《左传》中描述楚人祖先“筼路蓝缕,以启山林”;曾国藩屡战屡败,打落牙齿和血吞,最后打败了用教义精神武装起来的太平军。面对强大的皇权专制和外敌入侵,湖南人在革命力量非常弱小的情况下,抛洒热血、牺牲生命,成就了彪炳千秋的史话。改革开放后,湖南经济渐渐落后,湖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后发赶超、弯道超车、四个湖南、文化强省等战略,终于在2011年湖南省GDP总

值超过上海,跃居全国第八。这些都是湖南人奋发图强精神的体现。从这个层面讲,“筼路蓝缕”“自强不息”“积弱图强”“后发赶超”“坚韧不拔”都可以成为湖南精神。

第二,地处一隅,湖南人相当保守,但其一旦睁眼看世界,认准了某种真理,往往能够开风气之先,引领风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敢为人先”。

蔡元培曾在《论湖南的人才》一文中写道:“湖南人性质坚毅,守旧固然守得很凶,趋新也趋得很急。湖南人敢负责任。”其中的原因,最根本的还是湖南的地域因素,以及由此形成的湖南人的霸蛮性格,可谓守旧也“霸蛮”,开放也“霸蛮”。一旦守旧,可以顽固到底,一旦开放,就可以敢为人先。这种人是说到做到,少有那种市侩气的滑头。

“敢为人先”根本在于这种霸蛮性格赋予的决断能力,在于这种书生领军、领政的宏伟魄力。

近代以来的湖南领袖人物几乎都是读书人,善于追求真理、接受新知,也敢于坚守真理。过去书生的形象是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是书生”,湖南书生却是大异其趣,不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而是以行动见长,把追求真理和实践行动结合起来。

湖南书生一旦接受到了新的真理,马上就付诸行动。从魏源“睁眼看世界”到曾国藩、左宗棠开启洋务运动,谭嗣同变法以死警醒国人,黄兴、宋教仁流血革命实行民主宪政,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建立新中国,都不是空谈务虚、怕死畏缩,而是强悍行动,力挽狂澜。所以,“敢为人先”既包含了湖南人敢于行动的性格因素,塑造了湖南人虽身处一隅却在思想和行为上走在世界前面的果敢形象,也赋予了湖南人经世致用的色彩。

第三,湖南人具有胸怀天下的精神,湖湘文化中的忧世之心和忧患意识,使得湖南人有一种

改造天下的冲动。湖湘子弟对地理态势、攻守之策长久以来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慨然承担起天下兴旺的匹夫之责。

一代代湖南人“心忧天下”,为了民族的存亡,抛头颅洒热血,颇似远古的蚩尤,可以惊天地泣鬼神。

直到今天,湖南的读书人还是动辄以天下论,比如“天下湘商,星火燎原”“经营天下”。但是,在现代社会“心忧天下”往往被讥讽为湖南人“杞人忧天”。这不像民族危难的时刻,生存的急迫迫使每个人要承担国家的兴亡。在和平时时代,湖南首先要建设好自身,然后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作出独特的贡献,所以,莫若用“胸怀天下”一词作为湖南精神,在考虑自身发展的时候同时要有天下的胸襟——这也自然包含了爱国的精神了,胸怀天下即是爱自己的祖国。

第四,只有胸怀天下了,才能

更好建设和谐社会,包容他人。

近代以来,在民族存亡的压迫下,湖南人斗争和革命意识强烈,在推翻皇权专制和抵御外敌入侵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这也留下湖南人善于革命斗争,却不善于建设社会、发展经济的诟病。湖南人痛定思痛,进行了深刻反思,并提出了湖湘文化转型的问题。其实,湖湘文化本来是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不断融合新的思想,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是大有益处的。

由上所述,“和谐包容”作为一种湖南精神,这既是希望湖湘文化能够兼容并蓄,也能够与时俱进,反映新时代的发展潮流。“奋发图强、敢为人先;胸怀天下,和谐包容。”这就应该是人们心目中的湖南精神。



穿过凤凰城的古老河流

## 关于《陋室铭》的那些事儿

肖落落 枕 戈 秦汉月

《陋室铭》自出炉之后,有关其作者便受到了置疑。北宋僧人释智圆著《闲居编》说:“俗传《陋室铭》,谓刘禹锡所作,谬矣……”其依据是:不合“铭”的体裁,通常铭文是告祭先祖或纪念事成;不合刘禹锡为人,以仙、龙自比,过于狂妄;不合刘禹锡行文风格,没有在他的文集中找到类似文体。

近代,研究刘禹锡的著名学者,南京大学教授卞孝萱也持同样观点,他从文字上证明《陋室铭》的作者缺乏逻辑,乃拼凑成文:如“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完全违反常识,岂有仙居于矮山,龙游于浅水之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副瞧不起民众的口吻;既云“调素琴”,又云“无丝竹之乱耳”,琴不是丝类乐器吗?“有仙则名”是崇尚道教,“阅金经”是崇尚佛教,而来陋室“谈笑”的又是“鸿儒”,不是和尚、道士。

那么,《陋室铭》作者到底是谁呢?有人说,是崔沔。据《金唐文》记载,崔沔在洛阳做闲官时,曾著《陋室铭》以自广”。然而,《金唐文》并未刊载崔沔的《陋室铭》,就连崔沔生平事迹也十分简略。由此我们只能推定崔沔也写了《陋室铭》,但不能证明刘禹锡“抄袭”了崔沔的《陋室铭》。

应该说,释智圆《闲居编》成书时(宋祥符九年,1016年),《陋室铭》已经十分流行,据《闲居编》载:“昧者往往刻于琬琰,悬之屋壁。”而宋绍定年间成书的《舆地纪胜》(约1228年,王象之撰)记载:“和州陋室,唐刘禹锡所辟,有《陋室铭》,柳公权书。”即王象之见到了与刘禹锡同时代的书法家柳公权所书《陋室铭》——这是一份有力的证据(惜此碑现已不存在)。有此实据,历代主流观点均认为《陋室铭》即刘禹锡所作,至清代仍然编入普及读物《古文观止》,现代依旧编入中学语文教材。

《陋室铭》求解的方案有无数个,作为一个郴州人,我把刘禹锡与郴州(又称福城)放在一起研



天下第十八福地——苏仙岭

究,看是否契合。

刘禹锡于元和十年(815年)四月被贬连州刺史,元和十一年(816年)七月方抵连州上任,其原因他在《连州刺史谢上表》中说了:“南方疟疾,多在夏中。自发郴州,便染瘴疠。”此年四月,老朋友杨於陵被贬郴州刺史。此时,柳宗元也在郴州,并未去柳州赴任,有《奉和杨尚书郴州追和故李中书夏日登北楼》为证:“游鳞出陷浦,啖鹤绕仙岭……今日登高处,还闻梁父吟。”题中“杨尚书”即现任刺史杨於陵,李中书即原任刺史李吉甫,北楼在北海之滨。柳宗元还在郴州写了一篇流芳千古的《童区寄传》,此时居柳的是三位意气相投的文豪:杨於陵、柳宗元、刘禹锡。

《陋室铭》中,“山”指郴州之苏仙岭,“水”指郴州之北湖。苏仙岭海拔526.4米,是湘南群山中的小丘陵,然而苏仙的故事却全国闻名;北湖不深,仅2至3米,形如池塘,每逢大旱还会见底,然而蛟龙的故事却家喻户晓。郴州号称“九仙二佛”之地,仙佛的故事大都发生在唐代,是宗教气氛极浓的“天下第十八福地”。唐开元十九年(731年),唐玄宗下召修苏仙祠,这是皇家第一次为民间祭祀的苏仙修庙;开元二十四年

(735年),寿佛释全真出生于资兴程乡,少年曾在郴州城西的开元寺出家;建中年间(780年至788年),北湖恶龙作祟,道士曹代飞射杀之,受封“青史王”。此事据刘禹锡居柳约二三十年,禹锡的至交好友郴州刺史杨於陵到任即写了祭文。

在刘禹锡看来,郴州是块神秘的福地,“陋室”居于“福地”,自然不陋。

刘禹锡客居他乡,人生地不熟,自然没有多少人与之来往。他很可能是独自一人在此养病,“陋室”是暂时借住,自然不会大修整、大收拾,自然显得冷清荒芜。但刘禹锡住的“陋室”也不差,只是荒僻,没什么家当而已。篇中“鸿儒”自然是指郴州刺史杨於陵、未上任的柳州刺史柳宗元等一批志趣相投的朋友。

刘禹锡《连州刺史谢上表》云“自发郴州,便染瘴疠”,应该分析当时的政治背景。刘禹锡、柳宗元同是“永贞革新”被贬的“八司马”,可谓至交好友。元和十年,刘、柳二人同时被召回京城,另有重用。想不到又受到丞相武元衡的排挤,旋即被贬到更远的柳州、播州(后改连州)。他俩赴任途中,一路同行,谁知此时全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武元衡竟被藩

镇派来的刺客杀害,全国一片混乱。此时有天下大乱的趋势,贬他们的武元衡已死,朝廷收回成命也未可知,于是刘禹锡借病在郴州坐观形势。

刘、柳二人在衡州分路时有诗互赠,然而二人均与刚到任的郴州刺史杨於陵有诗词唱和,柳宗元和诗云:“今日登高处,还闻梁父吟。”刘禹锡和诗云:“一曲梁甫曲,知是卧龙才。”《梁父吟》、《梁甫吟》为同一曲,引用诸葛亮未仕前好为《梁父吟》的典故,或许此时两人又在郴城相聚。在《陋室铭》中,作者以“诸葛庐”自比,用典如此巧合,似乎与三人诗唱和有关,《陋室铭》以反问句“何陋之有”结束,显然是希望遇得明主,三顾茅庐。

刘禹锡文集为何漏掉了《陋室铭》?

《陋室铭》乃是文人酬唱的游戏之作,离开了郴州这块福地山水,就显得过于狂妄。因此,刘禹锡没有把它当成一件成功的作品收入文集。它能传世,可能是得益于篇中“鸿儒”杨於陵,是他在朋友圈中推而广之,以致流行。由于《陋室铭》朗朗上口,短小精练,且能明志励志,故深得文人雅士的喜爱,从而成为千古绝唱。

建立了未成年人活动室,供城市孩子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一起下棋、看书;开设了道路交通安全、网络知识、消防安全要领、爱国思想教育等课程,让孩子们参与感兴趣的活动,增长见识,减少了家长们的后顾之忧。15岁的中学生青青随打工的父母一起来到高桥街道,她告诉记者,寒暑假里她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未成年人活动室度过的。“在这里可以看书、健身,还可以交朋友。”

## 黄酒文化源头衡阳的尴尬

吕震萍

酒喝的是豪气,葡萄酒喝的是情调,而喝黄酒,似乎喝不出味道。甚至有不少衡阳人误以为黄酒的用途只是做“醉虾”用的调料,根本不能用来喝……

由此可以看出,黄酒的定位是多么地模糊不清,这个问题不达成共识,消费者必然无从选择,黄酒也将难以普及。尽管黄酒生产企业给产品贴上了“绿色、营养、保健”等功能标签,但是这个“功能”是否可以作为黄酒的准确定位,如何通过有效的传播与消费者形成共鸣,仍然值得业内人士深入探讨。

衡阳是黄酒的发源地,但其在业界的地位却远不如浙江绍兴,甚至不如本省岳阳的“胜景山河”,衡阳黄酒应该有所作为!

但酿酒毕竟是门博大精深的技术。湖之酒属甜型黄酒、发酵酒,选料精细,工艺严密,祖传秘方制出,传统工艺酿造。湖之酒的米、水、由三大要素,酒内所含人体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和26种氨基酸,得靠严格的材料选用和工艺,精确的配比和酒浸蒸、发酵、过滤,方能“备味滋和、体色醇清”。衡阳黄酒的口感、知名度及覆盖人群,依然面对的是一个严峻的局面。

黄酒虽然在近年发展较快,但从全国市场发展状况而言还处于初级阶段,消费者还没有对它建立初步的认知。作为中国最古老的酒种之一,由于长期以来局限于地区性市场(主要在江、浙、沪等地),使黄酒未能走向全国,市场规模也一直没有突破性增长,即使一些黄酒品牌通过努力走出了“家门”却没有市场,常常处于进退两难的纠结局面。

如何扩大衡阳黄酒的知名度与影响度,增加人们对黄酒的了解与认知,改造并提高黄酒的酿造工艺,使黄酒迎头赶上啤酒、红酒的发展势头,让衡阳成为真正中国黄酒的发源地与圣地,值得衡阳人思考与行动!

过了几年时间,发展壮大成拥有年产2万吨黄酒的现代企业,成为全国黄酒界最大的“一匹黑马”。被湖南省政府定位为湖南黄酒研发生产基地,被国家科技部评为“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遗憾的是,“古越楼台”前年底上市之际遭遇“滑铁卢”,这对湖南黄酒业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更让人浩叹的是,在不少衡阳人看来,白酒喝的是热情,啤

